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药品流通绩效的研究背景

一、历史背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对医药分销体制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传统药品“三级批发、一级零售”的分销模式在经济社会的转型中逐渐消失。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背景下，政府不断加快药品流通体制的改革适应新变化、新需求，特别是 2000 年以来，国家通过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药品生产经营管理规范（GMP）等一系列认证政策的实施，逐步规范了药品生产主体行为、流通主体经营行为和医药市场流通秩序，加快淘汰了一批生产经营落后的生产企业和批发企业，推进了药品工业产业结构和流通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通过加快产业之间兼并收购和与外资企业联合，不断提高医药产业集中度；在药品物流配送方面树立了“互联网+”的经济思维，逐步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供应链管理技术、现代物流技术和物联网技术，不断提高医药物流的配送效率和增值服务能力，现代流通理论的发展思想开始渗透和引领药品流通的整个领域，药品流通产业的长足发展基本满足了日益变化的药品流通需求。

2009 年实施新医改以来，在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公立医院改革试水“医药分开”、提高药品流通效率、降低药品流通成本、规范药品流通秩序等层面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百姓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但是城乡居民的医药费用负担仍没有切实减轻，就医看病的“获得感”仍需进一步提升。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在改善民生

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应保障药品供应，推进药品监管体制综合改革，巩固基本药物制度，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产业的发展。”全面阐释了现阶段药品流通产业的主要任务，既要确保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完善，保证百姓所需基本药物的可及性，也要逐步降低药品的流通价格，减轻百姓的就医负担。在降低价格和确保供应的双重社会责任挤压下，倒逼加快调整产业市场结构、优化企业市场行为和提高药品流通效率，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有为的政府作用形成合力，促进资源在药品流通产业企业间的合理配置，使药品流通市场的运营绩效得到有效提升。

现阶段，中国药品流通面临着异常复杂的国际国内竞争环境。世界发达医药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国际医药流通供应链快速向国内医药市场拓展延伸。一方面，发达国家对世界医药市场增长贡献率从2001—2009年之间由79%下跌到16%，其医药市场的需求接近饱和；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贡献2009年已升至51%，而其2001年的贡献率仅为7%，阐释出新兴市场国家的医药市场具有较大需求缺口。此消彼长，国外医药巨头企业凭借其技术研发实力、供应链管理技术和资金优势逐步向新兴市场国家延伸其供应链，外资进入医药流通领域多采用股权置换和联合投资的形式逐步渗透国内市场，导致国内医药流通的竞争预期更加激烈。

国际国内的历史背景阐释，面对日趋复杂激烈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已经进入“深水区”的新医改，只有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管理的不断变革，才能提升中国药品流通市场的运营绩效，增强药品流通产业的国际竞争实力，才能把事关重大民生福祉的新医改有效推进“深水区”，彰显时代的“共享”理念和公共服务能力，彻底破解“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毋庸置疑，药品流通产业提质增效已刻不容缓。

二、现实背景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是处于经济增速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认识新常态、顺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亦对药品供应服务保障体系提出了新的发展和改革要求。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快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全面推开展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在100个地级以上城市进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破除以药补医，降低虚高药价，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通过医保支付等方式平衡费用，努力减轻群众负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6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供给侧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推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的五大结构性改革，旨在优化供给体系，提高供给侧的质量和效率，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提升药品流通绩效的任务显得艰巨、重要而迫切。

经济新常态下随着中国经济整体增速放缓，药品流通领域结构性矛盾凸显、药品流通体制改革迟缓、公立医院改革举步维艰、药品流通市场低效率和无序性的被动局面没有显著改善，药品流通行业已经步入整体收入和利润增速放缓的新常态。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带来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轨迹的新变化，自2011年起增速逐年放缓，从24.6%逐步递减到15.2%，发展态势契合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即增长速度进入换档期，行业已告别连续8年复合增长率20%以上的高速发展阶段，转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药品流通市场销售规模稳步提高，但增长幅度有所降低，产业集中度仍在提升。据商务部《2014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报告》显示：药品流通行业的高速增长势头“减速”，今后将转向中高速增长，全国七大类医药商品销售总额为15021亿元，同比增长15.2%，增速较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其中，药品零售市场销售总额为3004亿元，扣除不可比因素，比上年同期增长9.1%，增幅回落2.9个百分点；药品流通行业利润总额增加，但增幅同比下降。2014年药品流通直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11321亿元，同比增长15.4%，增幅回落1.6个百分点，实现总利润247亿元。以上经济增速指标的逐年下滑，阐明新常态下药品流通产业的竞争格局正处于深度调整期。

现实背景凸显了通过提升药品流通市场的运营绩效，进而治理药价虚高、流通秩序混乱、行业利润率偏低和药品流通安全等重大民生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故此，客观准确研判药品流通市场的运营绩效，发现制约药品流通

绩效的主要因素，为新一轮药品流通体制机制创新和管理方式的变革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三、药品流通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现阶段政府监管的失灵和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未充分发挥，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流通体制改革的滞后性和制度设计的“适应性效率”低下，导致药品流通市场呈现出产业集中度偏低、流通市场秩序混乱、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缺失、流通服务竞争同质化等复杂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使我国的医药产业在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过程中出现一些新的阻力和矛盾。现阶段，药品流通领域主要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药价虚高

药品流通绩效极低是导致“药价虚高”的直接原因，药品多个流通环节层层加价导致药品的中间环节利润偏高，一般普通药品的购销差价在 5 倍到 10 倍，有的甚至在 20 倍以上，例如某医院的“芦笋片”，实际出厂价 15.5 元，招标采购价高达 185 元，中间环节毛利占零售价的 80%，其中包括给医生的回扣 100 元，给医院的返利 50 元，医院固定加成 15%，医院按照一定比例顺加作价的方式销售药品，实际零售价就变为 213 元。这些流通环节已经形成了灰色利益共同体，直接推高了药品的价格^①。由于“以药养医”体制下医院是主要的药品销售渠道，医院药品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 80% 左右；加上我国药品流通体制管理混乱、各监管部门之间协作性较差，没有形成监管制度上的合力，导致了药品流通效率低、价格扭曲、销售渠道异化等严重问题，以致出现天价药。据有关权威学者研究证明：目前国内药品的价格分配构成，生产企业一般占 30%、中间流通环节占 40%~50%，零售占 30%，而销售价高于出厂价 10 倍、20 倍的利润被隐性交易主体“鲸吞”^②。而在美国、

①李红梅. 20 倍，药品利润真那么高吗 [N]. 人民日报，2011-11-29.

②陈文玲，李秋菊，颜少君. 药品现代流通研究报告 [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药品生产环节获得的价值占比在 70% ~ 80%，包括批发、零售在内的流通环节占比则在 20% ~ 30%，而其中药品批发收入占比都低于 10%，甚至多数不超过 5%。药价虚高直接加重了患者的医疗负担。2011 年我国医院门诊病人均医药费用 179.8 元，住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 6632.2 元，一次住院费接近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 1/3，几乎相当于农民 1 年的人均收入^①。科学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和管理机制的缺乏直接助推了药品价格的虚高。

（二）药品流通行业利润率低

目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的商业购销模式向现代全产业链服务模式转型的关键时期，转型期的关键问题是我国医药物流的现代化、社会化和专业化水平较低，现代物流技术、信息技术和流通管理技术发展滞后，药品流通体系不完善，药品流通监管制度适应性效率低下，直接导致了我国现阶段药品流通成本高、流通绩效低的被动局面。据商务部数据显示：美国和日本的药品流通费用率仅为 1.5% 左右，而中国的药品流通费用率高达 7%；美国和日本的药品流通行业平均利润率为 2%、1.5% 左右，而中国仅为 1% 左右^②。中国医药流通业的尴尬在于行业价值链中存在医药代表、医生、医院药房组成的灰色利益链，医药流通受到产业链上下游的双重挤压，利润空间不断降低，资金占压日益严重。长期以来，医药流通企业的平均净利率一直徘徊在 1% 之下。

（三）医药物流成本高

2010 年中国医药产业的物流费用率为 11.1%，高出整体工业企业 1.4 个百分点，较高的物流成本是导致药品流通运营低效率的主要原因。目前中国的物流成本主要包含运输成本、管理成本、仓储成本、利息成本等，其中物流成本中运输成本占比 45.4%、管理成本 11.7%、仓储成本占 10.9%、利息成本占 6.7%，运输成本中油费占 40% ~ 50%、路桥费占 15% ~ 30%^③。

①王虎峰. 中国新医改现实与出路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②陈济生. 北医股份的医药物流服务延伸管理 [J]. 中国药品流通, 2011 (11).

③李秋实, 郑磊. 大物流背景下国内医药流通蓄势 [N]. 医药经济报, 2012-08-06.

2012 年中国医药制造业物流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 16.2%，增幅较上年回落了 13.1 个百分点。从重点企业物流统计调查数据看，增幅虽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但医药制造业的物流成本仍处较高水平。在物流成本中，运输成本增长 11.9%，增幅较上年同期回落了 11.6 个百分点；保管成本增长 18.2%，增幅较上年同期回落了 22.9 个百分点。其中：仓储成本增长 4.1%，增幅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近 4 成。配送、流通加工与包装的成本同比上升 13.7%，保险成本同比上升 20%，利息成本同比上升 15%；管理成本增长 0.2%。因此较高的物流成本是导致药品流通运营低效率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药品流通安全问题突出

中国假冒伪劣药品仍处于风险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从近期的“毒胶囊”到“重大疫苗案”等都说明药品流通安全监管任重而道远。例如 2016 年 3 月的山东疫苗大案，该案中疫苗批发企业参与“流弊”，将人用二类疫苗违法出售给无资质的人员，脱离监管“体外循环”一段流程后，又流入疾控部门、接种单位，流通全过程为实施冷链物流，非法疫苗流放 24 个省，涉案金额高达 5.7 亿元，暴露出目前对人用二类疫苗的监管还存在一定漏洞，因为药品作为一种特殊而相对贵重的商品，造假的预期收益远远大于违法成本，尤其是原料药、品牌药和一些进口药，其利润空间远大于一些普药和基本药物，是一些造假模仿的重点对象。目前造假规模大、覆盖地域广，从 2012 年全国十大假劣药品典型案例来看，全国共侦破制造销售假劣药品案件 1.4 万余起，涉案金额高达 160 亿；其覆盖地域达十几个省，为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造假有手工制作向机械化、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从近几年的假药案件来看，造假人员为追求高额利润，其涉案药品已经从普药向品牌药转变。同时互联网成为宣传和销售假冒伪劣药品的主要渠道。2011 年 5 月查获网络售假药案，收缴假药 17000 瓶、假保健品、半成品 69 万盒，涉案金额达 2000 余万元。互联网销售的虚假性、隐蔽性、集中性和高科技性增加了药品安全治理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整顿药品流通秩序、规范药品流通主体经营行为、降低药品流通成本，提高药品监管效率是当前新医改工作和医药产业发展的关键。药品流通市场运营绩效低导致了药价虚高、药品流通秩序混乱、药品

安全问题突出和卫生资源配置不均衡等一系列问题,进而引发了百姓的“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成为社会和谐发展和经济新常态下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民生问题。

(五) 政府对药品流通行业的财政支持不足

目前政府仅仅重视药品的保障供应社会责任,而忽视药品流通企业的高昂流通成本的公益性补偿,发改委对药品的持续降价和基本药物制度的逐步实施,使得配送基本药物的流通企业的利润不断降低,尤其是主要配送县级及县级以下基层医疗机构的企业,碎片化的基层市场很难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仅能依靠部分非基本药物的利润来交叉补偿较高的基本药物配送成本来维持企业运营。例如过低的中标价和较低的配送费率使得药品生产企业和配送企业都无法达到盈亏平衡点,偏远地区的配送成本高,企业不愿意配送,这使得基层医疗机构的药品配送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从国际层面看,英国医疗卫生支出占 GDP 的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从 2003 年的 7.80% 上升到 2010 年的 9.62%,这一变化趋势与 OECD 大多数国家的发展是一致的,在 OECD 国家中,美国医疗卫生支出占 GDP 的比例最高,2010 年达到 17.61%;除英国外,欧盟国家医疗卫生支出占 GDP 的比例大多为 10%~11%,而中国 2012 年占比仅为 5.1%。

在经济新常态下,药品流通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错综复杂、盘根错节,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原因、现实流通体制弊端、产业结构的深层矛盾和流通企业创新管理的不足等等。药品流通市场的绩效低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虽然在宏观层面、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都采取了积极的改革措施,但是实施效果并不明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精准地改革施策的前提是对当前阻碍药品流通绩效提升因素的准确研判,这就引发学界、政界的深入思考,影响药品流通绩效的核心因素到底有哪些?哪些是造成我国现阶段药品流通绩效低的主要原因?如何把握好经济新常态下的制度变迁、供给侧改革、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发展和“互联网+”的发展契机,切实提高药品流通运营绩效?基于这些问题展开对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药品流通绩效的研究。

第二节 经济新常态的现状为主要特征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得到高速和长足发展,2014 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 GDP 已高达 7800 美元,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之林名副其实的大国。但是面临着资源环境瓶颈约束、人口红利的极度衰减、“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累积、国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和欧美国家还未彻底走出世界经济危机的阴霾等一系列内有外患的困境,中国经济发展正步入“新常态”。201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中国发展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 2014 年 11 月的 APEC 会议和 12 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全面阐释,强调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认识新常态、顺应新常态和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一、经济新常态的现状分析

站在“十三五”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历史起点看,新常态的中国经济背景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层面。

(一) 中国正在由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

2014 年我国的 GDP 初步核算为 63.6 万亿,合计达到约 10 万亿美元,是 1978 年 GDP 的 429 倍。占世界经济总量 13.3%,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已取得阶段性成果,2015 年现代服务业已经超越第二产业占比 50.5%;消费对 GDP 的贡献率已高达 66.7%。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处于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型的关键时期,新经济新理念正在加速为经济发展积聚新动能,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新产品、新服务增长“领跑”新经济,拓宽就业渠道,特别是“互联网+”催生的新兴业态释放出巨大能量,要更加重视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全面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和技术创新。

（二）中国人口红利拐点出现，资源环境瓶颈约束凸显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就是人口红利的快速释放，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陆续向城市转移，相对过剩的劳动力直接拉低了企业生产成本和国内劳动力工资水平，国外制造业也纷纷离岸外包到中国，劳动力价值潜力的全力释放，推动了经济 30 多年的迅猛增长。但是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适龄劳动力的不断衰减，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中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2012 年，15 岁~59 岁的劳动人口比上年末减少 345 万，60 岁以上的人口比上年提高了 0.59%，2013 年，16 岁~59 岁的劳动力资源数量减少 244 万人。此外，资源环境的约束日趋加剧，目前我国淡水、一次能源、水泥、钢材、常用五类主要资源的平均消耗强度高出世界平均水平 90%，2013—2015 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分别比上年降低 3.7%、4.8% 和 5.6%，降幅逐年扩大，但是依然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石油、铁铜铝等资源要素的边际供给增量已难以支撑传统的经济高速发展。再者笼罩大半个中国的雾霾治理总体情况尽管稳中向好，但 2015 年达标天数仅比 2014 年增加了 14 天，重污染天气才减少了 1 天，雾霾的有效治理依然任重而道远。

（三）经济发展体制机制障碍较多，简政放权深化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我国目前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彻底完成，尤其是在生产要素领域还没有实质性进展，市场在资源要素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还需要经过一段时期。政府微观经济领域干预仍然较多，企业蓬勃发展的活力和创新力不足，行政性审批方式还在某些关键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简政放权的改革还需进一步加快。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深化改革是释放制度红利的重要抓手，并给新的阶段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但是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 and 攻坚期，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复杂性、纵深性、艰巨性，必须厘清政府与企业的边界，重新定位和调整政府职能，理顺体制机制，全力化解束缚经济转型的体制机制弊端，破除掣肘于深层次改革的利益固化的藩篱，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度调整期，国际市场有效需求萎缩

可以说，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仍不乐观，世界经济发展还没有彻底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面临诸多不确定、不稳定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全球贸易增长动力匮乏、局部保护主义浮现、国际恐怖主义几乎肆虐全球，经济全面复苏的道路迷茫而曲折。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日本经济发展长期停滞，日本“幸运”地躲过技术性衰退，但受制于新兴市场的疲弱需求，加上过度老龄化的重负，实施负利率之后仍复苏无望；全球央行也以宽松政策为主；美国经济的动荡也在不断加剧，2015年年末美国经济还捷报不断，但在2016年年初开始呈现渐入衰退的景象。欧盟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仍在继续、失业率居高不下，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且呈现加速态势，经济整体发展极不平衡，内部协调难度加大，整体经济增长处于极度低迷状态，俄罗斯和巴西等过度依赖资源、能源价格支撑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大幅度下滑，全球经济形势越发错综复杂。从全球治理体系看，各国纷纷加快调整发展模式，重塑和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积极抢占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价值制高点和全球竞争的话语权。中国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和政策措施，增强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正能量。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等中国外交理念，推动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全球治理的核心不是一种利益的交换和平衡，而是为了维护人类的共同安全，促进人类共同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对新秩序建构的过程。新常态下，中国应该充分把握“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契机，全面推进富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企业“走出去”。

二、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

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和引领新常态的宗旨是把握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简政放权深化改革，优化供给体系的效率和质量，破解供给侧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和矛盾，把握国际国内一切有利发展契机，全面推进新常态经济的提质增效。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层面。

（一）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增速换挡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增速换挡体现在中国经济正逐步由过去 30 多年年均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向 7% 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转换。经济增长适度回落是一个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之后的普遍规律。根据历年经济统计数据预测从 2016—2020 年，中国经济将进入到一个 6.5%~7% 之间的中高速增长阶段。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日本、韩国、德国等一批成功赶超型国家，均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高速增长之后出现了增长速度回落，根据经济成长周期性规律，这些国家实现由高速增长转换到中高速增长，再过渡到中速直至低速增长阶段。只要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保证较为充分的就业，减速换挡为经济转型升级，破解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提质增效留出调整空间、优化时间。可以为今后一段时间经济的长足发展注入新动力、激发新活力。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与世界各国相比，7% 左右的增速仍然是较高的增速，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明显高于主要发展中国家。因此，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是机遇期也是挑战期，是倒逼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产业发展由中低端水平转向中高端水平、坚定不移地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机遇期。

（二）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化

进入经济新常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已取得阶段性成果，2014 年我国的第一产业增加值 58332 亿元，增长 4.1%，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9.2%；第二产业增加值 271392 亿元，增长 7.3%，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2.6%；第三产业增加值 306739 亿元，增长 8.1%，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8.2%。其中，第三产业比重自 2012 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以后，2015 年第三产业已经占比高达 50.5%。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产业的大力发展，逐步化解产能过剩风险等举措的加快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力推进，使产业结构得到一定的优化升级。但是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主要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话语权依然很低。国内产业发展面临着传统产业和部分新兴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去产能任务举步维艰，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长期性矛盾突出。经济新常

态下，必须通过创新驱动发展和产业结构向中高端演进来加快化解这些矛盾和问题。

（三）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转换

发展方式转变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要求，更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新常态下必须权衡经济增长与环境成本的关系，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以能源为例，根据国家能源局的统计，在2004年制定的《中国能源中长期规划纲要》中提出，“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3亿吨标煤左右”，事实上，在2009年就突破了这一目标。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保持了年均接近10%的增长率，这是“量”上的飞跃，而不是“质”的提升，必须通过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化解当前我国制造业领域产能过剩、城市化质量不高、高昂的环境成本、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矛盾，集中表现就是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高。应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发挥我国产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较优势，着力构建与绿色发展、新能源、信息化相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大力强化资源节约，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力争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切实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经济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新四化”同步协同发展。要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通过管理创新、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来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的状况，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新发展理念渗透发展方式转变的各个阶段和各个环节。

（四）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

增长动力转换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发展的本质。纵观世界经济增长历程，经济增长不可能长期依靠生产要素投入和投资的拉动，要更多地依靠技术创新。绿色发展和环境治理也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创新具有至关重要的

意义。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美国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掀起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很好的例证。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输出锐减,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创新,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创新驱动发展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必须充分把握“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政策契机,通过推动新一轮改革,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创新能力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高等教育制度等,建立开放、合作、活跃、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新常态下必须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让创新切实成为新常态经济的重要动力引擎。

第三节 药品流通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随着人民健康消费的升级、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医疗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拓展,药品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提升层面的位置与日攀升,加快提升药品流通市场绩效的历史重任责无旁贷。本书将采用产业经济学的 SCP 理论范式综合分析整个药品流通的产业链,着重从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两个角度寻找影响医药市场运营绩效的关键因素,通过瓶颈因素的破解来实施药品流通绩效的提升。从实践出发提炼研究主题,结合对经典理论的应用价值分析,必对在新常态下流通经济理论发展和产业企业实践等维度具有丰富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理论意义

在理论方面:一是对流通绩效研究方法的丰富。流通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现有研究也多采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本书采用 SCP 这一西方产业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进行的分析,将是对流通绩效研究问题和方法的突破和丰富,拓展了现代药品流通理论研究的内涵,为现代药

品流通理论体系框架的设计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十三五”时期，经济新常态下药品流通产业的发展规划和国家药品流通体制的改革提供理论指导。二是本书的模型部分，将利用经典的双重加价模型来把握流通市场运行的演变机理，并结合药品流通市场的特殊性做多维度的模型扩展，这对双重加价模型是一种理论上的拓展，融合了现代流通效率理论和西方产业经济学市场绩效理论的研究，更是理论应用上的一种创新。

二、实践意义

在实践方面：一是依托于 SCP 范式从实证的角度研究现阶段中国药品流通的绩效，从方法上弥补了对现有药品流通绩效实证研究的不足，更是药品流通数据不可获得性约束下的一种开拓性尝试。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获得现阶段的药品流通企业运营绩效的一线数据，再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和熵权法进行了科学系统的评价，能较为准确和全面评价现阶段药品流通市场运营绩效，数据的丰富度和评价结果的客观性为学者继续研究经济新常态下药品流通绩效问题、产业企业层面的下一阶段决策发展和政府的宏观指导提供了实践素材。二是宏观层面，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准确客观评价药品流通绩效可以使政府以较低的制度和改革成本实施有效率的流通监管，全面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助于推行基本药物制度和以省为单位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创新，有助于政府对药品流通产业发展进行合理的战略规划，引导科学高效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降低药品流通领域安全事件的发生概率。三是产业层面，对流通绩效的客观评价为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发展规划提供决策依据，可以促进高效透明的现代药品营销模式的形成，实施现代供应链管理思想，可以通过电子商务和电子交易市场增加药品分销过程的透明度，有效减少药品流通中的“隐性交易”环节，规范交易主体，节约交易成本，规范流通秩序，提高流通绩效；引导优化并升级医药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四是微观层面，通过企业药品流通绩效的实证研究可发现影响药品流通绩效的瓶颈因素，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现代物流水平和药品配送效率的提升、创新驱动企业发展、知识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企业竞争行为和合作行为的规范提供指导。

第四节 药品流通的特殊性分析

药品流通不同于一般的流通行业,存在其特殊性,这也是我们选择该研究问题的主要原因,下面就具体介绍药品流通的特殊性。

一、流通客体的特殊性

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生产属性和消费属性不同于一般商品,具有半公共品的属性。药品的安全性、时效性和有效性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命安全和健康,药品流通的安全性是第一位的。药品流通绩效评价和流通机制的优化整合就是以满足患者需求为目标,在保证药品安全性、时效性和可获得性的基础上实现对整条流通渠道的物流、商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整合优化,对患者实现最大的服务价值增值。药品的这些特殊性,要求药品流通设计目标模式和基本框架时,必须把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专属性、可追溯性、可获得性和全过程的可视性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平衡的原则^①。

二、药品生产的特殊性和消费的特殊性

药品的生产周期较长、研发投入大,一般研发一种新药需要投入 8 亿 ~ 12 亿美元,从开始研发到药品首次上市需要 8—12 年(见 Grabowski, 1997)。较长的生产周期降低了流通快速响应能力,也不能实现商品的定制化生产。在过去 30 年,世界每年新药的研发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1961—1970 年研发新药数为 844NCEs、1971—1980 年为 665 NCEs、1981—1990 年为 506 NCEs (Balance, Pogany, Forstner. 1992)^②,再加上国际专利期的缩短,致使药品流

^①陈文玲,李秋菊,颜少君.药品现代流通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②Nilay Shah. Pharmaceutical supply chain: key issues and strategies for optimisation [J]. Computer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2004 (28): 929-941.

通市场上创新药不足，主要表现为大量仿制药的同质化激烈竞争。药品消费不同于一般商品，呈现为刚性需求，患者是药品购买者，但药品购买的选择权因信息不对称而被拥有专业技术优势的医生替代，还有医疗保险第三方付费的性质增加了消费的复杂性。药品流通渠道的异化，即医疗机构和医生处于医药市场的双边垄断的地位，相对于制造商、批发商而言处于药品零售的绝对垄断地位，尤其是处方药的销售；相对于患者而言在医患委托代理关系中处于严重的信息弱势，存在替代性选择和消费，医生通过其服务技术的诱导控制药品需求的品种和数量。可以说，生产的特殊性和消费的特殊性共同决定了流通渠道的特殊性。

三、药品需求的不可预测性

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药品的需求具有不可预测性，由于人体未来各种疾病的不可预测性和各种不可抗力突发事件的偶然性，使得制药企业无法从投资和扩大规模上平衡未来的生产能力和不确定条件下市场的需求，这是药品流通既要面临着压缩“牛鞭效应”的降低库存成本和提高流通效率的压力；同时又要为应对突发事件做好满足基本需求的药品国家储备体系，给药品流通的管理带来双重压力。比如对一些罕见和突发疾病，因为药品的研发生产周期较长，而不能使药品流通快速响应患者的需求；突发事件比如2008年的汶川地震，大面积受灾使得血库血液告急，消炎药和消毒液体等流通供应链面临着严重的断裂风险。

四、药品流通管制制度的复杂性

药品流通是一个流通前端（研发、生产）、流通过程、流通后端（药品销售、消费）等药品流通全过程，以及附加于医疗体制、保障体制和监管体制（安全、价格）的复杂系统问题^①。目前我国药品流通监管的部门较多，比如药品生产、定价、流通、消费等一系列环节涉及监管部门有工信部、发改委、

^①陈文玲，李秋菊，颜少君：药品现代流通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药监局、卫生部、医改办、商务部、质监局和工商局等，制度涉及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基本药物制度、GSP 和 GMP 认证制度、医药体制改革等。制度的“适应性效率”较低，庞杂的制度、频繁的改革要求药品流通的设计、运营和战略必须不断适时动态优化调整，才能实现流通的低成本高效率运营。比如 2000 年、2004 年和 2009 年等医药集中招标政策的频繁修订，2013 年初基本药物目录的增删。虽然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和基本药物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惯例的客观要求，是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核心制度，但是制度的复杂性和频变性从客观上要求药品流通体制不断优化整合，实现产业发展与制度的改革取向协调匹配。

五、药品流通运营的高风险性

药品流通风险性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药品流通较高的安全性、有效性、可获得性的要求增加了流通供应链的脆弱性。每一个药品流通安全事件发生就意味着一条流通供应链的断裂。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世界范围内医药贸易中有 5% ~ 8% 属于假冒伪劣药品^①。例如中国 2012 年 4 月的药用胶囊的铬超标事件，2012 年 9 月发生的地沟油生产头孢类药事件等，还有原料短缺等因素都时刻考验着流通供应链的稳定性。二是药品流通的品类繁杂。药品流通主要包括化学药、生物制药和中成药等上万种，甚至不同的包装、剂量、批次也成为划分药品种类的依据，药品种类繁多增加了流通的包装、分拣、配送的难度，这就要求多梯度多层次的流通网络来满足多维度的药品消费需求，同时也增加了流通运营的风险性。三是药品流通供应链向全球的延伸和竞争的加剧增加了流通的风险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药品流通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延长、原材料的短缺，不可预测性的经济、政治事件的频发等时刻影响着流通运营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①Robin Koh, Edmund, W. Schuster, etc. Attilio Bellman. Securing the Pharmaceutical Supply Chain [J]. Distribution Restricted to Sponsors until September, 2003 (1).